

《历史研究》 五十年论文选

(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目 录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林甘泉 / 1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戴 逸 / 33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林被甸 董正华 / 50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于 沛 / 84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白 钢 / 108
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	何忠礼 / 131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周积明 / 165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李根蟠 / 198
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袁祖亮 延 胜 / 248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明光 郑学稼 / 273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赵世瑜 邓庆平 / 316
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	常建华 / 357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	任 放 / 405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葛剑雄 华林甫 / 441
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荣新江 / 491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马大正 / 523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高华 / 554
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王子今 / 577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朱凤瀚 / 617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谢桂华 沈颂金 郭文玲 / 668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郝春文 / 737
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	刘重来 / 790
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沈长云 / 813
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周天游 孙福喜 / 848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曹文柱 李传军 / 908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国刚 / 971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曾瑜 / 1028
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	宋德金 / 1053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	南炳文 / 1101
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	钞晓鸿 郑振满 / 1152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 英 / 1241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冯筱才 / 1292
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夏春涛 / 1339
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姜 铎 / 1390
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戚其章 / 1413
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严昌洪 马 敏 / 1459
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	张友伦 / 1501

中国的英国史研究	钱乘旦 / 1527
中国的法国史研究	陈崇武 / 1549
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	黄定天 / 1576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回顾	王晓德 雷泳仁 / 1600
编后记	/ 1625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马大正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正如中国边疆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本世纪到来之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至少已有 2000 年以上的发展史，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遗产。

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逐渐实现由近代发展阶段向现代发展阶段的过渡后，又出现了始于 20 年代末的边疆史地研究新的发展高潮；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指导思想的转变、研究重点的转移、研究成果的分布和某些研究禁区的形成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局面；80 年代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已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本文将依据近百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脉络，分别予以概述。至于 1949 年以后，台湾省史学界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资料收集与整理，在并不理想的客观环境制约的条件下，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边政研究的格局，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他们的众多成果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总成果的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当另文阐述。

—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寻求强国富民的动力交相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 20 世纪前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向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演进的阶段，以下四个方面是应予重视的。

（一）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 20 世纪前半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则在包括边疆研究工作者在内的全民爱国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发展。

从中国边疆整体角度观察研究问题是本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突出体现。华企云著《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 年出版），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上篇综述边疆之沿革与现况，边疆之勘界与失地，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边疆邻接各地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之经过和边疆铁路之沿革与现状；下篇则分别论述国际角逐下之东三省、外蒙之独立、新疆之三大问题，英人侵略下之西藏和云南之界务问题。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 20 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在论述以上诸多问题时，又兼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问题，这样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即被明确地推上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这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还有：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引擎出版社，1937 年）、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

1937年)、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1942年)、蒋君章等《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等。

而同一时期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则更多。对于各个主要边疆地区的研究著作,东北地区有刘瑞麟、孙凤翔和赵崇荫辑《东三省交涉辑要》(常州刘氏,1910年)、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天津徐氏退耕堂,1911年)、徐世昌《东三省政略》(1911年)、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933年)、卞宗孟《东北史研究纲要》(东北大学,1938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等;北部地区有:姚明辉《蒙古志》(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卓宏谋《蒙古鉴》(1919年)、陈崇祖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华企云《蒙古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谢彬《蒙古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西北地区有: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议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年)、阚凤楼《新疆大记》(1907年)、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蒋君毅《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等;西藏地区有:许光世、蔡晋成编《西藏新志》(上海自治编辑社,1911年)、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年)、谢彬《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华企云《西藏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年)等;滇桂地区有:华企云《云南问题》(大东书局,1931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1933年)、陈碧笙《滇边经营论》(1938年)、孟森《广西边事旁记》(商务印书馆,1905年)、吴懋《广西边务沿革史》(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38年)等;台湾地区有:王子毅《台湾》(重庆自由出版社,1944年)、李震明《台湾史》(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

上述众多著作出版的时代几乎遍布 20 世纪前半叶的 50 年间，但以 30 年代最为集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19 世纪后期的边疆研究以对西北地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0 年代后边疆研究的各地区分布格局虽较前一段有所均衡，但北重南轻的格局尚未突破，特别是对海疆的研究就更薄弱了。

进入 20 世纪以后，大量研究论文的涌现是中国边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现代学术期刊的问世是中国学术研究步入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文稿作为刊物主要或重要内容的学术期刊即诞生于 20 世纪初，发展壮大于 20 世纪前半叶。

创刊于 1910 年由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和创刊于 1934 年由禹贡学会主办的《禹贡》半月刊在其间占了突出的地位。30~40 年代又相继出刊了一批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专业刊物，这批刊物包括：《新亚细亚》（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社，1930 年创刊）、《边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编，1931 年创刊）、《边事研究》（南京边事研究会编译组编，1934 年创刊）、《边疆》（南京边疆半月刊编辑部，1936 年创刊）、《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月刊社北平总社，1937 年创刊）、《边疆研究季刊》（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1940 年创刊）、《边政公论》（边政公论社，1941 年创刊）、《边疆研究论丛》（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 年创刊）、《边疆周刊》（中国边疆学会成都分会，1942 年创刊）、《边疆研究通讯》（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1942 年创刊）、《边疆通讯》（蒙藏委员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1942 年创刊）、《边疆人文》（昆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1943 年创刊）、《边疆建设》（东北边疆问题研究社，1946 年创刊）、《中国边疆》（北平中国边疆月刊社，1948 年创刊）等。这批刊物的组织背景是较复杂的，其中既有官方政府组织，也有文化教育单位和社会团体。各刊存在时间与社会影响大

小也各不相同,其中《边政公论》从1941年8月创刊至1948年12月出刊期间,其办刊有目标、有体系,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

(二)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群体

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新的群体逐步形成,研究活动已不再仅仅是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确。1909年9月28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一个基础广泛、与中国边疆局势及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现代学术团体诞生了,这就是中国地学会。中国地学会是成立于清代仅有的三个科学团体之一,除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外,一直存在到1950年汇入新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

中国地学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学科基础,其成员包括了一大批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有地理学家张相文、白眉初、黄国璋、王成祖,历史学家陈垣、张星烺、聂崇岐,教育家张伯苓、蔡元培,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卞荣光,水利专家武同举等。兴地学研究,以救国图强是学会活动的宗旨;唤起公众关心国家的安危与发展,促进地学各领域的学术进步,并使之普及于大众,就成为学会活动的始终目标。此时如此众多的学者自愿地组织起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以前常见的师生、门派、亲友关系,是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学术领域使他们集合于一个开放性的现代学术社会团体之中。这种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反映了现代社会意识和现代学术活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学会有组织的活动不但扩大了学者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声音,且因加强学术交流而促进了学科发展。

禹贡学会是继中国地学会以后成立的又一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筹备处成立于1934年2月中旬,正式成立於1936年5月24日。禹贡

学会与中国地学会一样，主要活动地点在北平，但与后者广纳各界人士参加不同，前者主要为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三校历史系师生组成。禹贡学会的发起与倡导者是顾颉刚和谭其骧，而顾颉刚则为学会最重要的组织者。禹贡学会先后吸纳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包括钱穆、冯家昇、唐兰、王庸、徐炳旭、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张政烺、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商鸿逵、王光玮、冯世五、侯仁之等等。《禹贡学会会章》明确宣布：“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史为宗旨”，而学会的工作范围“为搜集文书材料”，并实地调查，从事编辑中国民族史、地理沿革史、各代疆域图、各省分县图、文化统计表、地名辞典等图书^①。学会虽然制定了较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发展和众多学者的努力，学会活动领域有了越来越宽广的发展，正如顾颉刚在《禹贡月刊发刊词》中指出，“扩充范围乃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中外交通史、方志学等方面，蔚为‘历史的地理’之总集”^②。禹贡学会存在并开展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禹贡学会工作被迫停顿下来，至1946年3月10日，学会复原第一次会议召开，学会工作又延续了很短时间。内战爆发后，学会工作再陷停顿。1952年2月，在顾颉刚主持下禹贡学会结束了业务活动。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主要得益于学会有效且有特色的组织工作，而这又首先体现于学会拥有一流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一批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其次学会制定了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趋势，又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工作计划。禹贡学会的学术成功与成绩，又是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学会拥有数百名以燕京、北京、辅仁三所著名大学师生

① 《禹贡》第5卷第7期。

② 《禹贡周刊》第1期，载1946年3月21日《国民新报》。

为基础的基本学术队伍，进而拥有一批一流的学术骨干。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队伍也由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逐步遍及各地，这一动向不但成为发展的趋势，而且有着较为稳定的特征，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展中的现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新格局。最突出的事例就是随着云南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方国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主要基地，较为稳定地开展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要为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进而使原本较北部边疆研究明显滞后的西南边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整体布局和进步。

20 世纪前半叶（特别是 30、40 年代），一批官方或半官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团体也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对于这些团体的评价就比较复杂了。成立官办团体的首要目的是要为现政权的统治服务的，而显然当时的政府并未选对一条能使中国繁荣昌盛的正确之路；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其下属研究机构的每一具体举措都是不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因此，对于这些团体的作用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三）在拓宽中国边疆研究视野过程中发展的边疆考察活动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边疆实地考察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在传统的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考察继续得到发展的同时，对西南边疆——主要是云南、西藏地区的考察亦有相当进展，但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则是新疆地区的考察和研究。

新疆地大物博，多民族聚居一处，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 20 世纪前半叶，这里政局动荡，外来势力介入。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格伦威尔德和勒柯克、日本人大谷光瑞等纷纷进入新疆活动。他们

虽然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他们中有些人无视中国主权,滥挖遗址并偷盗文物,这就使他们在华活动的性质变为一种强盗侵略行为。

国人对新疆的实地调查与考察,大致有官方组织、学术团体组织和个人活动三类^①。清末对新疆进行个人游历性考察的成果有: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西征续录》(郑树荣抄本)、1907年赴疆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4卷(河海昆仑客署本)、1910年赴疆的袁大化《抚新记程》(新疆官报印书局宣统三年刊本)和1910年赴疆的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1941年铅印本)等。辛亥革命后不久,北洋政府亦派人赴疆考察,以求治新之策。1915年冬林竞赴疆考察,历时9个月,作考察报告《新疆纪略》(天山学会1918年4月铅印本),重点提出修通道路和移民实边的对策。1916年谢彬赴疆考察,历时14个月,在对天山南北进行广泛考察后,重点提出开发新疆、发展经济、便利交通的对策。

20年代至30年代,对新疆的考察以中国和瑞典联合主办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最为著名。1927年4月26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订协议,共同组团进行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方面的考察。中方团长为徐旭生(炳昶),团员有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等共10人。从1928年2月14日抵哈密至1929年1月27日徐旭生等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次综合性科学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近世以来,中国人在维护主权的条件下与外国学者平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边疆考察工作,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团结与日趋成熟。

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新疆的考察成果最丰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对新疆的三次考察(即1928~1930年、1933年和

^① 参阅马大正《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1943年)。黄文弼考察工作的重要成果有《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

(四)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当首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业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前身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成立于1925年。在其后的24年里,档案文献的编辑出版始终得到特别的重视。与中国边疆问题有关的档案文献集有:《筹办夷务始末》、《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朝鲜国王来书》、《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朝)》、《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初中日交涉史料》、《广西沿边各营驻防中越交界对汛法屯距界远近图》、《故宫俄文史料》等。文献馆还出版了《掌故丛编》、《史料旬刊》。上述档案文献的刊布,对于近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与界务交涉有关的近代中外关系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是,如果从档案文献编纂学角度来审视,当时史料编纂工作尚存在较大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选题、选材的随意性,较多注意史料的新鲜趣味性,所以题材比较芜杂,材料也未经全面搜集,基本上是采取编者随手捡来,难求完整系统。在编辑加工方面,文献一般不加标题,也无标点分段,有的甚至没有目录,也没有编例或编者说明。

在跨越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连年内乱、社会动荡,总的来看,边疆地区的方志编纂显得冷落,所成诸志,精心之作不多,但“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边疆方志中仍保存了一些社会历史实录。晚清的方志编纂中,乡土志的撰写工作尚有建树。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催促各县编修乡土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统计,现存全国乡土志493种,其中陆疆省区编存乡土志列表如下(见下页):

	完成于清朝末年	完成于民国年间
黑龙江	3	2
吉林	18	14
辽宁	29	2
蒙古	无	无
新疆	39	无
西藏	无	无
云南	12	1
广西	2	2

将有关图书编辑在一起做成丛书既方便读者查阅，又扩大了原书的影响，这对选题比较分散的中国边疆史地古籍而言就更有意义了。从 20 世纪初起，不断有新的丛书问世：金匱浦氏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6 集 28 种（上海书局，1903 年）、胡思敬编《问影楼舆地丛书》10 册 15 种（1908 年）、丁谦撰《蓬莱轩地理学丛书》28 册（1915 年）、中国地学会编《地学丛书》（1921 年）、李季等主编《中国内乱外祸史丛书》（1936 年）、吴丰培和顾廷龙编校《边疆丛书甲集》6 种（1936～1937 年）、吴丰培编《边疆丛书续编》6 种（1946 年）等。除了综合性边疆研究丛书，还有地区性边疆研究丛书问世，较著名的有：金毓黻编《辽海丛书》87 种（1933～1936 年）、赵藩和陈荣昌编《云南丛书》152 种（1914 年）。

二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实际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前 17 年和文革动乱 10 年。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理论的准绳，同时也成为指导中国人民日常思维和生活的准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之中，不仅仅是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已是学问家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时尚，而且是真心实意地在科研工作中实践着。

从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过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超过了1919~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具体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是前人无法企及的，尽管走过的路不是平坦的。但我们必须坦率地指出，所有这一切变化，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开展，并未带来太多实际的推动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总体性、完整性和重要性尚未为研究者所认识，即使是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也遭到冷落。

可是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在50年代以降特定社会条件下，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密切相关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却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一）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兴旺

帝国主义侵华史在这一时期史学研究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与当时时代背景有关。此时研究内容的两个方面：一是澄清史实，恢复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掠权割地的历史本来面目；二是揭露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此时研究的重点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尤其是美国侵华历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和卿汝辑《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第一卷1952年，第二卷1956年）是此时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代表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揭露英国侵华的著作，有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该书集中阐述了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英国

对西藏地区侵略的全过程。其他如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 年）和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凌大珽《法帝侵华史》（新潮出版社，1951 年），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 年）等，则是对英、法、日等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对列强侵华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鹂、沈自敏、贾维诚、康右铭、李明仁等学者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 年初版，1961 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起止时间是 1840～1895 年，是书第二卷在中断 20 余年后至 1985 年出版，写到 1919 年。全书虽未告成，但仅就一二卷而言，已是迄今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最引人注目的成果。50 年代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中，对于沙皇俄国侵华活动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大片中国领土的历史更是噤若寒蝉。随着 60 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沙俄侵华史研究才日益为政治家所倡导。1969 年中苏两国重开边界谈判，某些苏联学者为了替苏联政府的扩张主义立场制造根据，大量歪曲中俄边界形成史，公然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辩护的论著不断出版。这就使得主要从事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研究论著，以澄清历史真相。此时除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俄关系的论文外，还出版了几本沙俄侵华简史。这些论著与文章，依据历史事实，驳斥苏联学者的错误观点，既为揭露霸权主义做出了贡献，也打破了建国以来中俄关系史研究的禁区，同时也表明，即使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直学者的良知仍显示出其灼人的光辉！

与近代界务交涉有关的资料编辑出版，当时由于受到种种规定的限制，仅有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鸦片战争》（1～6 册，神州国光社，1954 年）、《中法战争》（1～7 册，神州国光社，1955 年）、《中日战争》（1～7 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 年）中有所涉及。